

安吉拉·卡特作品中的“蛇蝎美女”分析

吴端明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蛇蝎美女”的文学形象古而有之。与各种文学体裁融合,“蛇蝎美女”在不同时期体现了不同的性格、行为和特色。关于她的创作随着时代的进展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同时,这些形象也反过来影响了社会价值导向与行为。她的形象貌似简单刻板,实则充满二元对立的张力。卡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笔下的“蛇蝎美女”与众不同,她们既有着这个类型的共性,又体现了独特的个性。她们颠覆了女性作为“被凝视的客体”这个概念,打破了表演性,从而改写了命运。此外,卡特在她的作品中表达了对这个类型创作的思考。

[关键词]“蛇蝎美女”;卡特;二元对立;“凝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6)05-0098-05

Analysis of “Femme Fatale” in Angela Carter’s Works

WU Duanming

(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ts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Femme Fatale” image ha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Incorporated in different literature styles, “Femme Fatale” shows different characters, behaviors and features in different times. These “Femme Fatale” images guide the social values and actions. In spite of the simple and rigid first impression, the whole concept of “Femme Fatale” is full of power and tension in its binary opposition. As for Angela Carter’s creation of “Femme Fatale”, they have the commons of the type but also a lot of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s. They subvert the concept of being the “gazed object” and break through performativity, thus rewrite their fate. Also, Carter expresses her ideas on the creation of “Femme Fatale” type in her works.

Key words: “Femme Fatale”; Angela Carter; Binary Opposition; “Gaze”

西方文学中从来都不乏“蛇蝎美女”(femme fatale)的形象。从最早圣经中的夏娃、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墨杜莎、到莎翁笔下的克里奥佩特拉和麦克白夫人,历经浪漫主义时期和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蛇蝎美女”形象层出不穷,展现了丰沛的生命力与表现力。这些“蛇蝎美女”的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她们的微妙变化折射了文学潮流的转向,也反映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从“蛇蝎美女”的形象塑造和展现中,可以窥见社会对于女性的审视和焦虑。“蛇蝎美女”的

形象貌似肤浅、僵化和公式化,背后却充满了二元对立的张力。就艺术魅力而言,这些女性形象是亮点所在,令作品充满悬念,在完结处仍然意蕴悠长。

安吉拉·卡特作为 20 世纪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以魔幻主义见称。在作品集《焚舟纪》中,她改写了大众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颠覆了众多童话角色形象和故事精神,作品中处处可见大胆的创作和想像。在她笔下,也有一些“蛇蝎美女”的形象,包括《爱之宅的女主人》^[1]中的女吸血鬼和《紫女士》^[2]中的美艳木偶。两者都在这个类型的基础上有所

收稿日期:2016-09-06

作者简介:吴端明(1980-),女,广东肇庆人,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创新,而紫女士与她的操纵者关系恰似“蛇蝎美女”形象与创作者的关系,卡特在作品中表达了对于这一类型创作的思考与戏谑。

一 “蛇蝎美女”创作与批评综述

所谓“蛇蝎美女”,是指美貌的女性,她利用自身令人无法抗拒的(性)吸引力而使男性陷入危险的处境。^{[3]8}就这个定义而言,有几层含义:“首先,是她在性方面的诱惑力。第二,由这种性吸引力而产生的权力。第三,围绕这个谜一般的女性的欺骗、伪装与迷惑不解,无论对于观众而言还是对于男主角而言,她都是一个不甚明确的人物。第四,这个不可解之谜一样的女人的意义,就在于在侦探型的叙事结构中,透过重重欺骗找到所谓的真相”。^[4]

西方文学长廊中有一系列的“蛇蝎美女”的形象。旧约创世纪记载,神对亚当及夏娃说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知善恶树”上的果实“不可吃”,否则他们便会死。最后夏娃受魔鬼(蛇)引诱,不顾上帝的吩咐进食了禁果,又把果子给了亚当,他也吃了。上帝便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偷食禁果被认为是人类的原罪及一切其它罪恶的开端。而在希腊神话中,宙斯要求潘朵拉不可以打开神秘盒子,但是潘朵拉不敌好奇心的诱惑,还是偷偷的把盒子打开了,原本宁静没有任何灾害动乱的世界开始动荡不安起来。因此,人类不断地受苦受难,生活中遭遇种种挫折和折磨。这两个典故有一些共通之处,夏娃与潘多拉都有着能妩媚和诱惑男人的外表,有着以语言或者谎言迷惑人的天赋,又同时漫不经心地闯祸,连累男人或者整个世界的秩序陷入混乱的苦况中,她们是最早的“蛇蝎美女”的形象。

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也有一些“蛇蝎美女”的形象,如麦克白夫人和克丽奥佩特拉。在麦克白夫人的怂恿下,麦克白暗杀了国王邓肯,自立为王。在自责与幻想的折磨下,他很快堕落成为一名暴君,变得自大与疯狂,并最终走向灭亡。在剧作《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莎士比亚把克莉奥佩特拉描绘成父权制社会的威胁,因为她的存在,勇士安东尼沉浸酒色,纵情饮宴,丧失斗志。

希瑟·布劳恩在她的专著《英国文学中“蛇蝎美女”的兴衰,1790-1910》中,系统地梳理和阐述了一百多年间文学作品中“蛇蝎美女”的演变,以及这些变化背后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潮流: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诗人们采用哥特民谣的

形式,引入了“蛇蝎美女”的形象,这个时期的“蛇蝎美女”大多带有超自然的力量,可能是死去的恋人化身鬼魂重返,也可能是致命女性为了旧日的仇怨而来报复。柯勒律治的《克丽丝特贝尔》和济慈的《冷酷的美女》两篇作品中,都出现了在树林中游荡的神秘美女,美女的身世成谜,伴随着美女的出现天现异象。男主角在梦与醒之间经历了奇遇,同时故事中也隐约透着杀机与危机。及至维多利亚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蛇蝎美女”的形象回归现实,变得更为脚踏实地。聪明又有魅力的未婚女性,她们从事家教或者工厂工作养活自己,当机会到来的时候,利用美色与智慧把自己嫁出去从而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在萨克雷的《名利场》中,蓓基就是这样的角色。她隐瞒自己的出身,处处谄媚逢迎,利用一切机会向上爬,风光无限。但是,她的成功是短暂的,她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个时期的小说还特别地关注到了女性在家庭范围外的发展和她们尴尬模糊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在煽情小说中,出现了反传统的女性形象。不同于此前的超自然的女性和求之不得的女神,煽情小说炮制了潜藏在家居中的女凶手,哥特风往家庭这个传统的安全范围延伸。犯罪女性和家庭中的贤妻良母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布雷登的代表作《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中,中下阶层的女主人公被第一任丈夫抛弃后迫于生活的压力,离家出走,隐姓埋名且犯下重婚罪。为了保住社会地位和掩盖犯罪事实,她千方百计地试图摆脱并谋杀第一任丈夫以及所有可能对她的地位产生威胁的人。在这个类型中,“蛇蝎美女”的描述还融汇了犯罪情节的设计。^{[5]7}

在经历了整个十九世纪前所未有的发展后,“蛇蝎美女”这个形象在文学领域开始失去她独有的魅力。这个被过度发掘,过度描绘的文化图标变成被嘲讽的对象。世纪末的作家面临着创作上的困境:如何在颓废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去重新认识和利用这个老旧的,被过度滥用的文学图标。“蛇蝎美女”的生命力和活力似乎到了一个静止的阶段。^{[5]11}

总括这些致命女性的形象,可以试图探寻她的内涵。在“蛇蝎美女”这个概念的构造中,首先有一组矛盾的特征:外表的美貌与内在的腐化,她能利用欺骗等手段演绎不同的性格,从而掩盖自己真正的意图、感受和身份。^{[3]29}外表的光鲜与吸引力更方便她行使内心的黑暗,这个混合的特质使她越发神秘。“女性的复杂性使男性为之神往,到底她是天使还是魔鬼?这种不确定性令她成为迷一般的存

在”。^{[6]215}“这样的女性能激发出两种情感:她能激发异性恋取向的男性的欲望;另一方面,她的动机意图能引起恐慌。当然,她能够充分利用她的性吸引力来掩盖自身充满威胁感的目的。以弗洛伊德的术语来描述,她综合了两种本能:即性本能(*Eros*)和死的本能(*Thanatos*)”。^{[3]7}

另一方面,“蛇蝎美女”与“贤妻良母”是二元对立中的两极,“邪恶、荒唐、放荡”对应着“母性、纯真、处女”。事实上,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构思女性身份时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娼妇还是处女?^{[3]6}“吸血鬼和女巫们伤了男人的心,而这些创伤会由母亲,忠诚的未婚妻,和耐心的妻子抚平”。^{[6]217}尽职尽责,温柔耐心的妻子与母亲,坚定地守卫着家庭的平稳与安宁,从家庭范畴维护了男权社会的秩序。而致命美女引诱男性堕落腐化,蒙蔽他的内心,打断他的进展,被视作离经叛道和稳定社会的一大威胁。在文学作品中,这些致命美女的黑暗阴谋大多会被揭穿,得到应有的惩罚,野心勃勃、控制欲强的女性们最终也会回归到家庭主妇的位置,资产阶级的家庭理想再次实现,而社会秩序也得以回复正常。

“蛇蝎美女”对于文化与社会的影响是不容忽略的。赫奇科克在她的专著《维多利亚文学中的“蛇蝎美女”:危险与性威胁》中提到:“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男人,甚至不少的中产阶级女性都惧怕“蛇蝎美女”背后所代表的文化转变。男人们担心社会权力流失到野心勃勃的女性手中,而女人们则担心有一些男人会选择结婚(来规避危险的女性),这样她们就不能通过结婚来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7]11}所以,“蛇蝎美女”通过小说媒介的流传引起了当时风气保守的社会的不安。而从赫奇科克的眼光来看,维多利亚中期的“蛇蝎美女”是文学中的一个醒目标识,反映了十九世纪女性角色的变化,中产阶级女性开始组织更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运动。同时,“蛇蝎美女”的反叛也预告了在不久的将来女性对于不公的对待将会进行更为激烈的抗议。^{[7]2}一方面,文学作品中的 人物形象反映时代的变化,另一方面,这些比生活更大胆更夸张的形象微妙地影响社会价值取向并引导行为。西姆金的专著《“蛇蝎美女”的文化构建》围绕着一个理论框架:即现实生活中的危险(犯罪)女性(在媒体/新闻)上的再现……与各种文化建构的致命美女(包括戏剧、小说、视觉艺术、电影中所呈现的形象)都是无可避免地捆绑在一起的。即各种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所制造的“蛇蝎美女”的大众接受令他们

带着前见或预定的偏见,所以大众在接触生活中类似的案例和人物时,会以习惯的套路来理解和诠释。这个循环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虚构的影响现实的,现实的反过来影响虚构的。^{[3]39}正如普莱斯所言:“我们的流行文化表达并再造了社会意识形态”。^[8]

二 《爱之宅的女主人》:蛇蝎美女的宿命反转

安吉拉·卡特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了独特的带着她的标记的“蛇蝎美女”形象——老宅中的女吸血鬼。这个形象开始于重复经典与老套,却迎来了不一样的结局。她既有着致命美女普遍的共性,但是在作者的书写下具备了更多的个人特质。她既是行凶者,又是受害者,内心感情丰富、脆弱而又敏感。

女吸血鬼“美到不自然的地步,那份美是一种畸形,一种缺陷,因为她的五官完全不见任何不完美缺点,而正是那些动人的缺点让我们能接受人类处境的不完美。”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女吸血鬼会引诱这些不小心送上门的男人,“那些笨拙男孩便一手拿着快泼洒出来的杯子,另一手拿着饼干,目瞪口呆看着身穿丝绸华服的女伯爵。她从银壶中倒出咖啡,同时随口闲聊让他们放下心来迈向死亡,眼神中有中寂寥的静定,显示她无法得到抚慰。她多想轻抚他们瘦瘦的棕色脸颊,抚摸他们蓬乱的头发。当她牵起他们的手将他们领进卧室,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走运。”吸血鬼深知自己的美,并了解如何演绎这种美和性吸引力缠住猎物,满足自己嗜血的胃口。同时,她身上所带的威胁感和致命性又让人足以紧绷与警惕:“指甲与中国古代官员的指甲一般长,磨得尖尖。这指甲和白如棉花糖的利齿,……磨利她爪与齿的是许多个世纪以来的尸体,她是毒树上最后一朵花蕾。”吸血鬼之美、性吸引力和她的危险性都切合了致命女性的形象和特质。

然而,卡特的创意在于对女吸血鬼的塑造并不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在“蛇蝎美女”的套路和公式中,阴谋被揭发——坏女人遭到惩罚——父权社会秩序回归正常是情节中的三个必经阶段,卡特在这三个环节进行了创新,她笔下的女吸血鬼与众不同。首先,吸血鬼意识到男性在看待自己时所带的色情眼光,从而按照性客体来进行表演。这种展示柔媚与魅力的表演帮助她达到目的。就如伯杰所指出的:“男性表现(*act*)而女性表演(*appear*)。女性意识到落在自己身上的异性目光,她关注这种目光

……女性不只是被审视的对象,同时,她也是一个(自我的)审视者。因为,她在他人面前的表现,特别是她在男人眼中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这决定了她的人生能够有多成功。她对于自身的定义和评价很大程度上在于她能否得到别人的欣赏—实质上就是男性的欣赏”。^[9]西姆金也认为,女性对于异性目光的敏感和意识促使她不断地调节自身的行为和形象,也就是说,她的行为充满了表演性。^{[3]43}吸血鬼按照男性的传统心理与目光进行表演,目的性极强,操练多次且无往而不利。但是,这一次她却遇到了年轻的陆军军官,一个不一样的对手,他看待吸血鬼的目光全然不同:“他走进起居室,满脑袋计划。我要带她(吸血鬼)去苏黎世看医生,治疗她的歇斯底里紧张症;然后去看眼科专家,治疗她的畏光,然后去找牙科医生,把她牙齿形状修整得好一点;至于她的指甲,任何像样的指甲美容师都能处理。我要把她变成不负她美貌的漂亮女孩,我要治好她所有的梦魇。”年轻的陆军军官目光单纯,他对于她身上的性吸引力和周遭阴森可怖的环境视若无睹,他看她的眼光传递了关爱和同情,“英俊的单车骑士为女主人的健康和神志担忧……他真想把她抱在怀里,保护她不受墙上狞笑的祖先危害。”这种目光是如此不同寻常,传递了两性平等和携手共进的希望。吸血鬼依照这种关怀的目光反观自身,透过她习以为常的单调重复的表演,体察到内心的真正需要—正如透露她命运的塔罗牌,一张情侣的牌。小说此处的安排在于打破了“蛇蝎美女”套路中识破阴谋的公式,男人忽略和无视吸血鬼的阴谋,他的目光也不同于一贯好色的眼光,从而帮助吸血鬼打破了她与生俱来的宿命。

萨萨在她的专著《美国文学中的“蛇蝎美女”》中,提到过这样一个观点:“女性为她们在社会中的处境感到为难。她们受制于宿命论,同时,又努力去寻找自己的自由与个性。她们试图反抗周遭的环境,摆脱控制,听从自己的内心与意愿。她既是一个受害者,同时又试图加害她人。她受制于环境与处境,但内心渴望自由。由此产生了蛇蝎美女,纠结于宿命与自由意志之间”。^[10]尽管萨萨总结的致命女性的特征是针对美国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时期的相应作品,但在实际中却能应用得更为宽泛。老宅中的女吸血鬼逃不过自己的宿命和祖先的诅咒,必须年复一年地猎人为食,她只能“无法自禁地继续祖先的罪行”,“独坐在那黑暗高耸的大宅,承受画像中众多癫狂残暴祖先的眼神注视”,即使不断翻动和组合塔罗牌,不停构筑各式可能的星座般

组合,但这些都无法排解“她既是死神又是处女的永恒悲哀”。然而来自英俊单车骑士的一个吻,一个“像她母亲一样”,能让她伤口不痛的吻,让她结束了她作为死神的使命,也结束了她作为“蛇蝎美女”的使命。卡特巧妙地安排了女吸血鬼的结局,女吸血鬼因爱而烟消云散。她以结束存在的方式,对抗了她的宿命,也对抗了致命女性在父权社会必然的结局—被审判、被中性化和无害化、或回归到规定的轨道生活,这也是对传统“蛇蝎美女”结局的改写。不同寻常的男性目光决定了不同寻常的发现;以爱带动自由意志,扭转被安排的命运,正是卡特笔下的独一无二的女吸血鬼。

三 《紫女士之爱》:蛇蝎美女的狂欢与衰落

《紫女士之爱》是卡特作品中实验性较强的一篇,主角紫女士是一具没有生命的木偶,借助操控者之手在剧场活灵活现地展现她作为妓女的生活。在木偶剧中她纵情声色、贪恋财富、玩弄男人并以杀人为乐。作为一个“蛇蝎美女”,她恶毒之至,生活方式极尽荼蘼,最后在极度放纵中走向毁灭。在木偶剧之外,经过多年的表演,操控者与紫女士的生命似乎已经相依相连,紫女士的灵动全赖于操控者的精准控制。在剧终之时,木偶重归沉寂,操纵者在为木偶打理装束时倾注深情一吻,木偶却借助这一吻将操纵者的生命吸入体内,从而获得了自己的新生,在变化人形后,投奔向她必然的归宿—一城中唯一的妓院。这篇作品的创新之处在于叠套了戏里和戏外两个故事。在戏里,卡特把玩了“蛇蝎美女”的种种可能,把“蛇蝎”的致命毒性描写到极致;而在戏外,操控者与木偶紫女士的关系也值得探究,两者的关系如同作者与角色的关系,作者创造了“蛇蝎美女”的角色,给予这个角色生命力,但是却受困于无法创新,这一类型的创作走向衰竭。卡特在此表达了对此类创作的戏谑和调侃。这篇作品一如卡特以往的风格,大胆诡异,充满奇思,语言装饰性极强,令整体读起来更似“蛇蝎美女”的狂欢。

在这篇作品中,性是一个突出的元素。紫女士是让人神魂颠倒的妓女,她的美色与技艺让男人为之倾倒。“她是独一无二的欲望行使者,周身繁衍恶性幻想,将情人们当作画布,创作闺房杰作,涂绘毁灭。她散发的电力足以使皮肤为之触发。”“肉体是每一家的招牌菜,热腾腾端上来,配上你想象得到的任何佐料。教授的傀儡木然而敷衍地演出这些战术,就像玩具士兵假装进行一场肉欲之战。”卡

特对于肉体与性吸引力的毫不避讳和狂放与前辈作家的小心翼翼大不相同。如福柯所言,“性是一个可疑的对象”。^[11]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们谨慎地对待性,性在作品之中是一个重要线索,女性的不检点性行为能牵扯出她不光彩的过往,由性带出犯罪与黑暗的秘密。破解这个黑暗的秘密,社会秩序回归正常。^{[7][12]}与此对比,卡特在性方面的表述尺度要大得多,而且不至于此。紫女士以性为手段,以虐杀男人为目的,普拉兹把这种致命女性对于男性受害者的诱杀行为称为“性食同类”(sexual cannibalism),^[12]这个术语所指的就是小说中致命女性以性为诱饵然后施行虐杀的情节。借助马戏团木偶剧场中的魔幻色彩和虚构空间,卡特放飞想像,无所顾忌,把紫女士的性吸引力和致命天性无限放大,穷尽了“蛇蝎美女”这个类型中所有放荡的可能,紫女士是她的同类之中最为极端的一个。

在戏外,紫女士既是个木偶,就依赖于她的操控者—亚洲教授。“傀儡愈是栩栩如生,就表示他的操控愈是出神入化,而僵硬木偶与灵活手指之间的共生共栖关系也愈是对比强烈。操纵傀儡的人在真实与看似真实之间一处三不管地带投机取巧,穿针引线于我们一活生生的观众,与他们一不死的木偶之间。”“她一定是某个早已辞世的无名工匠的呕心沥血之作,然而若没有教授拉动她的线,她只不过是一具奇特的构造。是他,如死灵法师一般,为她注入活力。他的生命力似乎薄弱,却能传送给她丰沛的生命力。”教授与木偶之间的共生共栖关系恰如作家与他们所创作的“蛇蝎美女”的关系,作家塑造一个角色,赋予她生命,角色是否形象传神全赖于作家的功力。“蛇蝎美女”类型的创作,融合了各个时期的特点,融进了各类文学体裁。看似简单刻板,实则包容着丰富的变化与内涵。然而,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后,关于她的创作也无可避免走向枯竭与僵化。在卡特的故事中,紫女士通过一个吮吸走了教授的生命,“随着那一吮吸尽他肺中的气息,自己的胸口开始起伏……他连叫喊一声都来不及,被吸空的他随之滑出她的怀抱,窸窣落在她脚边,像满满一把的枯叶被扔下,就这么萎顿在地板上,跟他落在地上堆成一团的羊毛围巾一样空洞、无用、没有意义。”没有了教授,木偶即使获得生命,也只能重复她单调的思维中所知道的唯一方向与动作—“投向城里唯一的妓院。”操控者已死,就如作家已死,是卡特对于这类创作困境的戏谑和调侃,“蛇蝎美女”的创作失去了活力,流于单调重复。

四 结语

“蛇蝎”美女形象体现了时代特色,同时透露了社会对于“危险”女性的审视与焦虑:一方面为她们的“美”而深深吸引,另一方面希望她们的“蛇蝎”本色不会危及父权的秩序。这个形象本身所包含的“外表美—内在神秘”,“贤妻—娼妇”之间的二元对立也令她能保持十足的张力与表现力。所以,关于她的创作经久而不息。卡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所创作的致命女性与别不同,她们不只是“被凝视的客体”,同时,她们的行为也不仅仅为了“表演”,从男性的关爱目光出发,她们关注自身内在的真正需要。同时,卡特敢于创作最为狂野与离经叛道的“蛇蝎美女”,她们是这个类型中的极端,挑战了该类型的极限,也表现了卡特对于此类创作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安吉拉·卡特. 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M]. 严 韵,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2] 安吉拉·卡特. 烟火[M]. 严 韵,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3] SIMKIN S. Cultural Constructions of the Femme Fatale from Pandora's Box to Amanda Knox[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 [4] TASKER Y. Working Girls: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Popular Cinema[M]. London: Routledge, 1998:120.
- [5] BRAUN 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emme Fatale in British Literature, 1790-1910 [M]. Lanham: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6] DE BEAUVOIR S. The Second Sex [M].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Borde and Shella Malovany - Chevallier. London: Vintage, 2010.
- [7] HEDGECOCK J. The Femme Fatale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the Danger and the Sexual Threat [M]. New York: Cambia Press, 2008.
- [8] PLACE J. "Women in Film Noir". Women in Film Noir [M]. Eds. E. Ann Kaplan. London: BFI, 1980:47.
- [9] BERGER J. Ways of seeing [M]. London: Penguin, 1972.
- [10] SASA G S. The Femme Fatal in American Literature [M]. New York: Cambia Press, 2008:18.
- [11] FOUCAULT M.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69.
- [12] PRAZ M. The Romantic Agony [M].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78:215.